

## 【史学家研究】

## 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及其对内藤湖南的影响

单磊

【摘要】赵翼在考论历代史籍中烛照中国史学变迁之大势,形成“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唐宋时期发生了史书文体由崇尚骈体到推重散体、史书编纂法由崇尚照录到推重别裁、修史组织形式由“一家著述”到史馆分纂等一系列变迁。这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史学变革”说提供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内藤湖南阐发此说时的核心论断、具体观点、所选论据、论证逻辑、叙述思路、谋篇命意、文字表述均显著地表现出承袭赵翼思想的痕迹,并在其基础上扩大了视野,深化了认识,完善了思维进路,强化了理论自觉。赵翼之所以对内藤湖南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缘于二人在史学理念、治史风格、学术见解、思维品质和性格特质上的深度契合。

【关键词】赵翼;内藤湖南;唐宋之间;史学;影响

【作者简介】单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湖南长沙410082)。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17.3.29~40

【基金项目】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6-20世纪中国史权变迁问题研究”(项目编号:531107050892)阶段性成果。

学界热议的“唐宋变革”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历史层面均得到较多论证或辩难,唯在史学层面的探讨较少。作为“唐宋变革”的组成部分,唐宋时期史学变革是平民化在史学领域的表现,与整个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我曾撰稿阐发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旗手之一内藤湖南(1866~1934)“唐宋史学变革”说之几微,并提出该学说深受清代乾嘉学派主将之一赵翼(1727~1814)启发<sup>①</sup>,因主题和篇幅所限而未及展开论述。赵翼为内藤建构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理念、旨趣、方法、风格和具体见解上都对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内藤对赵翼史学思想的承袭是全方位的,在论点、论据、论证、叙述思路、文字表述上均显著地表现出承袭痕迹。本文拟阐发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并运用文献对照和逻辑推演的方法,揭橥赵翼史学思想对内藤此说的深刻影响。

### 一、史书文体由崇尚骈体到推重散体

南北朝至宋之间,史书文体由崇尚骈文体转变为推重散文体(古文体)。赵翼与内藤对此均有具体

论述,后者多承袭前者之说。

韩愈、柳宗元通常被视为唐代古文风尚的首倡者。赵翼不以为然,明确指出“唐古文不始于韩、柳”。内藤以相似的论据和论证方式得出同样的论点。为让读者有一直观认识,兹列表1对照如下(左右两侧相同下划线内容对读,下同)。

二人都以《新唐书·文艺传》所称古文起自韩、柳作为标靶,举出独孤及等例证予以驳正,最终得出一致结论:唐代古文并非韩愈首倡,之前就有开风气者;大历、贞元年间是由骈体到散体的转型期。

既然古文非韩、柳首倡,那么真正的首倡者是谁?赵翼从史书文体变迁与古文复兴之关系入手明确给出答案:“古文自姚察始。”内藤循其思路得出同样的结论(见表2)。

世传“古文运动”起自韩愈,却不知姚察、姚思廉父子于唐初已开其端绪;在六朝骈四俪六文风大盛之时,姚氏父子自觉摒弃骈体,率先运用散体,是史学中文言复兴的先驱;纵然作为总裁官的魏徵在《梁书·总论》中仍沿用旧体,也阻挡不了史书文体革新

表1

中唐“古文运动”不始于韩、柳

《廿二史札记》	《中国史学史》
<p>《新书·文艺传·序》：唐兴百余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英才辈出，播哮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为一代法，此其极也。是宋景文谓唐之古文由韩愈倡始，其实不然。……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西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又如陆宣公奏议，虽亦不脱骈偶之习，而指切事情，纤微毕到，其气又浑灏流转，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此岂可以骈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开风气者矣。<sup>②</sup></p>	<p>关于古文的复兴，从文章家的立场来说，唐中叶的中心人物是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评价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新唐书·文艺传》也说，古文兴起于韩、柳。其实，古文的开启当略早于此……当起自韩愈所师从的前辈的时期，即太历(代宗)、贞元(德宗)时期。当时曾掀起对古学的崇尚，独孤及、梁肃等人仿效前汉扬雄、董仲舒文章写作古文，韩愈向这些人学习，有志于古文。……太历、贞元年间古文的兴起，从文章家的立场来看，是个文章变迁的时期。<sup>③</sup></p>

表2

正史运用古文始于姚察父子

《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	《中国史学史》
<p>《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鑪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偶，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sup>④</sup></p> <p>《宋》、《齐书》传论多四六体，盖六朝文笔相习如此。至姚察则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虽魏郑公所撰《梁纪·总论》，亦不及矣。<sup>⑤</sup></p>	<p>至南朝宋齐时期，史学文体中骈体文流行；六朝末至唐初之间又有了古文的复兴。……从史学来说，古文的兴起还要更早些。……(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写史时，改变了迄《宋》、《齐》二书为止所使用的骈体文文体例，而改用了散文的体例。六朝时骈体倍受推崇，以至叙事文也要使用四字句而很少使用散文。……《梁书》的总论是魏徵写的，使用的几乎都是骈体文，但姚氏父子还是断然放弃了骈体文的使用。他们可以说是史学中古文复兴的鼻祖……<sup>⑥</sup></p>

之大势。内藤在论点、论据、论证乃至文字表述上与之十分相似，可见受其影响之深。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史书文体的转变不会是孤立的。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分析其发生的历史因由，是深化认识的重要路径。赵翼从政治导向与社会风习之矛盾出发，解释史书文体的变迁。内藤的论述上与之别无二致(见表3)。

王莽曾在政治与文体之间建立起联系，苏绰在撰写诏诰时仿《尚书》文体将骈体改为散体，为后来制诏所宗尚。骈体到散体的转变虽是适应政治形势而发生的，且为朝廷所倡导，但这股文体复古之风终究没能抗拒住崇尚骈体的世风，散体制诏于北周昙花一现，之后骈体制诏重新流行。文体的新陈代谢有其自身规律，是人们在创作实践中理性抉择的结果，政治手段固然能收立竿见影之效，却难以从根本

上扭转其发展方向。当此“世运”而致“非功令所能禁”，“时会所趋，积而难返”，真切地道出了个中真谛。两人在考察视角(政治与文体之矛盾)、涉及的人物(王莽、苏绰、宇文泰)和典籍(《尚书》、《周礼》)、事件发展情节等方面完全相同，承袭关系一目了然。

北周时散体尚难以取代骈体而成为主流文体，唐初出现了新情况。赵翼探究了《南史》、《北史》文体的变化，力图揭橥其内在理路。《廿二史札记》卷十、卷十一和《陔余丛考》卷八、卷九皆为考论《南史》、《北史》之内容，其中对二史因删汰文字之需而改骈体为散体多有评述，如：

《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如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其他列传

表3

后周散体制诏

《廿二史札记》	《中国史学史》
<p>王莽好仿《尚书》作诏诰……文句全用《尚书》，此盖刘歆等为之弄笔也。宇文泰在西魏当国时，从苏绰之言，官制仿《周礼》，诏诰亦仿《尚书》。其官制至魏恭帝时始奏行之，而诏诰则《大统》中已大变骈俪之习。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命苏绰作《大诰》，颁行之，自后文笔皆依此体。……是时宇文泰已歿，而诏谕如此，盖朝廷之上用《尚书》作诰，久已相习为常故也。当六朝时，骈体盛行，而绰等独能复古，可谓转移风气者矣。然时会所趋，积而难返。……周时虽暂用古体，而世之为文者骈俪自如，风会所开，聪明日启，争新斗巧，遂成世运，固非功令所能禁也。<sup>⑦</sup></p>	<p>在后周时期产生于政治上及文章上的一种复古的趋势。后周曾经有在制度上力图实行理想政治的时期，在后周高祖宇文泰还是西魏宰相的时候，他已经任用苏绰改革制度。苏绰改革了以往因循秦汉以来自然发展形成的制度，按照《周礼》的官制建立了新型制度。……他又出于对《周礼》的喜好而偏爱古典学问，并且废弃诏敕骈体文那种浮词的使用，开始仿效《尚书》文体。这种政治与文章上的革命，是王莽以来的第一次。王莽因复古主义失败了，苏绰的方法却很适合当时。这是因为随着政治的自然发展，弊害不断增多，因而有必要进行整理。但是，他的理想未能被继续下去，从隋至唐代又再度兴起骈体文制诏的情况。<sup>⑧</sup></p>

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谓“刊落酿词，过旧书远甚”者也。<sup>⑨</sup>

作为记述南朝和北朝史事的通史，《南史》、《北史》所据史料多为既存史籍，而旧史不乏重叠、抵牾之处，涉及诏谕、敕令之类多用骈体。二史据旧史而成的特点决定了史书文体不得不变。李氏父子大量删汰旧文并大刀阔斧地变革文体乃势所必然，实质是要打破僵化的骈体对自由意志的束缚进而凸显史家主体意识。

这种不同凡响的见解和思路被内藤敏锐地捕捉到并被借以展开论述：

《南史》、《北史》虽说并未刻意地将骈体文史书改写为古文，但是在删节简约原书内容的过程中，又确实自然地出现了不再墨守骈体文的情况。在《梁》《陈》二书已经开始使用古文之后，《南史》、《北史》的成书更加助长了摆脱骈体文趋势的兴盛则是很明确的。<sup>⑩</sup>

《南史》、《北史》则出于对以往史书进行简化文章的需要，竭力将其改写，带有趋近散文的倾向。但是，这毕竟是出于简单易行的目的，而不是像姚氏父子那样从一开始就以散文为目的的。如此看来，史书的发展又是与古文的发展有其相互关系的。即伴随着古文的发展，使用司马迁、班固那种史书撰述方法，即使用古文义法的做法，与将以往繁杂资料予以

简单缩写的做法发生了合流，从而迎来了唐以后史体的一大变化。……史论家中虽说有人并没有理解改写的真正意义，但是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仍可以说那是一种具有各自编纂主张的议论。<sup>⑪</sup>

李氏父子变骈体为散体的初衷是为编撰史书方便而删繁就简，不及姚氏父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神自觉，但其行为客观上顺应了史学变革的趋势，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赵翼与内藤对该问题的认识在逻辑和观点上具有相通性。内藤站在近代史学发展的高度将史书文体变迁与体现个性、表达自我的编纂思想变迁统一起来考察，可视为对赵翼思想的发展。

紧抓体现史学风尚变迁的经典史籍是赵翼阐发“唐宋史学变革”思想的重要路径。《廿二史札记》卷十六至卷十八及《陔余丛考》卷十至卷十二几乎全是在这种思路统摄下展开的。他通过对两“唐书”的对比分析来展现史学变迁，堪称典范。内藤借鉴了这一经典思路，在《中国史学史》中专辟章节探讨两“唐书”的差异，以揭明其旨。

与史书编纂法之间的矛盾是史书文体变迁的内因之一。赵翼对两“唐书”史书文体变迁的论述正是结合编纂法的变迁来展开的，内藤基本承袭了其思路和见解(见表4)。

作为“旧史学”代表的《旧唐书》沿用六朝以来的骈体，遇到骈俪诏疏一仍其旧；作为“新史学”代表的《新唐书》则大异其趣，不仅在文体上效仿古文，还在

表4

两“唐书”文体变迁

《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	《中国史学史》
<p>欧、宋二公皆尚韩、柳古文，故景文于《唐书》列传，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遗。<sup>⑮</sup></p> <p>《旧书》纪传后有论尚仍四六体，惟《顺宗纪》则全用韩昌黎散文耳。且论后有赞，虽仿范史，究亦繁复。《新书》改四六为古文，又删除韵语，尤为得体。……《姜皎传》，《旧书》载玄宗宣布其功之诏系四六，乃唐时原文也。子京既不欲以四六入史，则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译者。<sup>⑯</sup></p> <p>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造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六朝以来诏疏尚骈俪，皆载入纪传，本国史之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骈体中有新语不忍弃者，则宁代为改削存之。……子京于四六不欲存，又不忍弃，委曲斡旋之苦心矣。……章疏之类，有关政体治道者，或就四六改为散文，或节其要语存之，固未尝概为删汰。此则子京用意之深，不以文词而没其议论耳。<sup>⑰</sup></p>	<p>《新唐书》过于偏重古文风格，采韩、柳文章笔法，材料也多取之韩、柳。<sup>⑱</sup></p> <p>《旧唐书》毕竟是依据了唐初的那种历史编纂法理论而成书的，而不是唐中叶兴起之古文与史书相关联的新型理论的代表作。……欧阳修、宋祁都仰慕韩愈，其学问、文章皆有韩愈的风格，所以能够应用韩愈以来古文复兴的意见，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主张，有着与以往史书完全不同的创新。……</p> <p>《新唐书》与《旧唐书》最主要的不同还在于以古文写史这一特点。《旧唐书》由于照用了骈体文全盛时期的史料，所以多使用骈体文；这在《新唐书》几乎全都改写为了古文，诏、令、表、奏等也不仅限于删改，而是全部用古文重写。……三百年间的诏敕当然不可能都与世无关，可《新唐书》却完全不载，未免极端过甚。……宋祁偏好韩愈、柳宗元文风，所以《列传》中不但采用了韩柳笔法，即便韩柳文章的内容也有采入的情况。<sup>⑲</sup></p> <p>《新唐书》又是出于对古文与史体关系之自觉意识而撰著的，因此也是明确划分了史体时代的著作。<sup>⑳</sup></p>

内容上直接取材于韩、柳，对骈俪诏疏大量删削，对用骈体写成而又难以割舍的内容尽量以散体改写。赵翼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反复叙及宋祁、欧阳修转换文体之苦心孤诣，如：“《新书》于《旧书》内奏疏当存者，或骈体，或虽非骈体而芜词过多，则皆节而存之，以文虽芜而言则可采也。……此正宋子京作史之深意，非徒贵简净而一切删汰也。”<sup>⑲</sup>改骈体为散体不独因宋、欧二人对古文有“癖嗜”，更在于落笔之“深意”：散体更有利于表达史家的编纂主张。最终《新唐书》因其自觉意识而成为“明确划分了史体时代”的经典。《中国史学史》引文省略部分中三次明确提及援引赵翼著作，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所不同者在于赵翼以评析现象为主，内藤则从学理上做出抽象性论断。

## 二、史书编纂法由崇尚照录到推重别裁

如前所述，史书文体与史书编纂法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其中编纂法居于主导地位。南北朝至宋史书文体变迁缘于史书编纂思想的内在需要，是对由重形式到重内涵的史学观念变迁的自觉适应。

汉唐之间被视为美德的“实录”蕴含秉笔直书（忠实客观事实）和照录旧文（忠实原材料）两层含义。换言之，“实录”品质既体现于客观历史文本化过程中尊重历史的观念，又体现于历史材料史学化过程中尊重历史文本的观念。“唐宋史学变革”在编纂法上的表现，就是由推崇客观精神的照录原材料向体现出主体意识的别出心裁转变。

赵翼触探到汉唐之间史书多照录旧文而少别出心裁的特点。沈约奉敕纂修《宋书》不到两年即成百卷，赵翼以“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而持怀疑态度，细绎之，方知该书乃增删旧史而成，随后考述该书承袭徐爰旧本之过程，评论道：

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sup>⑲</sup>

史家修史有避讳之法，但《宋书》当讳者不讳，不必讳者而讳。这种反常现象乃《宋书》照录旧文而不加别裁所致。赵翼运用类似的方法揭明《梁书》多照

录旧文而少别裁的特点：

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国史本讳而不书，察仍其旧也。……无国史可据，而《梁书》亦遂不为立传。尤可见《梁书》悉本国史，国史所有则传之，所无则缺之也。<sup>③</sup>

《梁书》有三大弊病：繁芜(当删者未删)，省略(当传者不传)，讹误(不必讳而讳)，其中以繁芜之弊最为显著。这些弊病是照录国史而不加别裁所致。他评述《旧唐书》曰：

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抄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知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后修史时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乃《旧书》书法仍复如此，知其全用旧史之文，不复刊正也。<sup>④</sup>

顾宁人谓《旧唐书·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以为修史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国史原文，不及改订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庄又谓此书修于后唐，后唐自以继唐后，故以唐为本朝，并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笔。此亦曲为之说。后唐时而犹以玄宗、德宗为今上乎？此非国史原文乎？<sup>⑤</sup>

不必回护者多回护，当改订者未改订，皆因照录旧文而不加别裁所致。赵翼驳正了顾炎武和王鸣盛的误解，揭示了《旧唐书》照录国史旧文的特点。

照录旧文的情况并非特例，而是汉唐之间史书的普遍现象。赵翼申说此旨，在见解和思路上都对内藤造成强烈冲击。由于二人的论述均散落各处，这里仅选取关涉《汉书》、《宋书》、《南史》的部分内容来阐明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见表5)。

处于“旧史学”序列的《汉书》、《宋书》多照录原材料，而删润既存史籍而成的《南史》多别出心裁，已表现出“新史学”的气象。崇尚照录的《宋书》芜杂不堪，推重别裁的《南史》则简净允当，一繁一简，优劣乃见。《南史》删润《宋书》是“新史学”革除“旧史学”弊病的表现。

唐初，触探到史学发展内在理路的优秀史家在史学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照录旧文的缺陷和别出心裁的优点，遂自觉舍弃旧型编纂法而运用新型编纂法。如前所述，在史文书体的革新上，姚氏父子走在时代前列，李氏父子紧随其后。但在史书编纂法的革新上，李氏父子优于姚氏父子。赵翼对该问题着墨甚浓，如，对《梁书》与《南史》作对比分析：

(姚思廉)文笔亦足称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载诏、策、表、疏之类，稍觉冗繁，而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亦不能过。<sup>⑥</sup>

《梁书》诸王及功臣列传，必载其没后加恩饰终

表5

汉至唐编纂法变迁

《廿二史札记》	《中国史学史》
<p>《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文，而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史迁云云。所引《过秦论》及《战国策》、陆贾《新书》之文，亦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某人。<sup>⑦</sup></p> <p>(班)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武帝以后诸传，亦多载有用章疏。……总计《汉书》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sup>⑧</sup></p> <p>《宋书》本过于冗繁，凡诏诰、符檄、章表，悉载全文，一字不遗，故不觉卷帙之多也。……《南史》于此等处一概删削，有关系者则隐括数语存之，可谓简净，得史裁之正矣。宜乎宋子京谓其刊落酿词，过于旧书远甚也。<sup>⑨</sup></p>	<p>当时对历史材料的使用方法，都是尽可能不对材料做过分的润色和订正。这不仅是历史学家，也是一般著述家所遵循的原则。……这种对材料的取舍方法在以后的史书中也有，像《汉书》等就是从《史记》相同的趣旨出发编纂的。赵翼《廿二史札记》也认为《汉书》中多载有用之文，像诏令、奏议等属此。载入这些文章时虽然多少会有所删繁就简，但是大体上是以保存原文为宗旨的。<sup>⑩</sup></p> <p>从《南史》、《北史》开始，就更是为了尽量简化记事，而屡屡删减原文了。……沈约的《宋书》，由于仍然墨守了保持材料原文的原则，所以尽管所记载时代甚短，书的部头却很大，以致于在《南史》编纂时据说《宋书》是被削减最多的。<sup>⑪</sup></p>

之诏,盖本国史体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应删除以省繁复。……殊可呕哕。其后作史者亦自知其芜冗……<sup>②</sup>

《梁书》叙事虽简洁,然其所载文词仍循《宋》、《齐书》旧式,故亦不免繁芜。……《南史》列传止书赠谥,尽削诏词,是以较本书最为醒目。<sup>③</sup>

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隐括之,以归简净。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sup>④</sup>

《南史》改编《梁书》而收简净美名,并非因为李延寿的文笔优于姚思廉,而应归功于编纂法的革新。崇尚照录的《梁书》不及推重别裁的《南史》那样文约事丰。《南史》对《梁书》的改编不独显其删削之能和补缀之功,更见其“意存斟酌”之旨。这表明李延寿革新编纂法并非盲动之举,而是出于理性自觉。内藤持相同见解,作出相似的论述,认识到以唐初为中心,之前与之后编纂法有显著差异。<sup>⑤</sup>

与论述史书文体变迁一样,赵翼通过对两“唐书”进行对比分析来论述史书编纂法的变迁。《旧唐书》对“旧史学”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肯定,《新唐书》对“新史学”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追求,新、旧“唐书”的升降沉浮表明,生命力强劲的“新史学”取代暮气沉沉的“旧史学”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内藤循其思路展开了十分相似的论述(见表6):

表6

两“唐书”编纂法变迁

《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	《中国史学史》
<p>《旧唐书》列传之文高下不等,其简当完善者类多国史原文……子京……于《旧书》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大约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新唐书》有全代古文作文者。……造语用字尤多新奇……极意避俗,戛戛独创者,未免好奇之过,然尚多新辟可喜。<sup>⑥</sup></p> <p>论者谓《新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此固欧、宋二公之老于文学,然难易有不同者。《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苴,其事较难。至宋时文治大兴,残编故册次第出见。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精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诸人皆博闻勤采,勤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籍为笔削之地。<sup>⑦</sup></p>	<p>在成书时曾公亮的上表中,介绍此书特征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再就搜集史料来说,《旧唐书》主要是依靠《实录》等官方的材料;《新唐书》则不同,多取小说的材料,当然这种小说并不是虚构的作品,而是那些逸事和论事之类无人负责任的著述。……虽然批评家皆反对《新唐书》而称赞《旧唐书》,但实际上史家的编纂法在《新唐书》以后却多摹仿之。……在各种评论之中,无论如何最后出现的《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是最为公平的观察。……《新唐书》的《纪》、《传》与《旧唐书》相比,最为不同之处在于,不再像《旧唐书》那样仅取《实录》为材料,而是喜欢采用小说,而且这并不是由于编纂《新唐书》时唐代《实录》已经不存。……两书方针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编者的指导思想不同,而不在于所据材料的如何。<sup>⑧</sup></p>

论述<sup>③</sup>,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论据可以证明内藤承袭了赵翼思想(见表7)。

相较于照录原材料的《旧五代史》,别出心裁的《新五代史》有三个显著优点:一是文笔简净而史事详瞻,二是考订精核;三是个人私纂,多用“《春秋》笔法”,史家主体意识更强。这些优点得益于《新五代史》运用了新型编纂法。左右两侧引文在基本观点、论据选取、论证思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大同小异,承袭关系十分显著。

### 三、修史组织形式由“一家著述”到史馆分纂

与之前史书多为私家撰述不同,南北朝后期始建史馆制度,修史组织形式呈现出由“一家著述”向史馆分纂转变的趋势。到了唐代,史馆制度趋于完善,修史组织形式的转型加剧,之后史馆分纂居于主流。

私家撰述表现为修史者为一人或一家。赵翼对唐之前“一家之言”、“一家著述”有清晰的认识:“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sup>④</sup>;“后世修史遂成官书,古时如司马迁、李延寿之类,则自作一家著述”<sup>⑤</sup>;“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sup>⑥</sup>内藤著作多处明确指出援据赵翼见解,并沿其思路论述道:“唐以前的史书多为私人著述,是专门的学问,其中家学又是特别显著的倾向”<sup>⑦</sup>;“虽然直至唐代的历史著述还大多是私家著作,即是作为一家之学的产物,但是从唐代开始已经变为召集众

人的编纂。”<sup>⑧</sup>

赵翼通过对《南史》、《北史》改编各史的考述,认识到出自一人或一家的史书往往比假众手而成的史书质量好。南北朝史事错综复杂,头绪纷繁,史书记述真伪莫辨,是非失准,而“一家著述”能够克服这些弊病。如,此期史书多出现的“一人二史各传”现象在“一手编纂”的《南史》、《北史》中得到较好的处理<sup>⑨</sup>。再如,此期南北交兵事迹甚多,由于立场不同,史家“各自夸胜讳败,国史固各记其所记”,直到李延寿“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方才结束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史学乱象<sup>⑩</sup>。

《南史》、《北史》虽发扬了《史记》、《汉书》“成一家之言”的风格,但终究抵挡不住修史组织形式变迁之大势。随着史料丰富,史官世袭观念淡化,由一人或一家承担修史重任的方式显得不合时宜。到了唐初,史馆在修史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赵翼对此反思颇深,认识到史馆修史利弊兼具:以利言之,朝廷督办便于延揽人才,整合资源,如《隋书》享“严净”之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sup>⑪</sup>的因素;以弊言之,史官素养良莠不齐,假之众手难以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如武德五年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历年不就而罢”<sup>⑫</sup>,经三次组织纂修始成<sup>⑬</sup>。纂修高质量的史书既需要一位史学素养较高的核心人物统摄全局,又需要建立一套一以贯之的修史义法以统合全书。赵翼称:“(令狐)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

表7

两“五代史”编纂法变迁

《廿二史札记》	《中国史学史》
<p>五代虽乱离,而各朝俱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今按其纪载,不惟可见其采取实录之迹,而各朝实录之书法,亦并可概见焉。<sup>④</sup></p>	<p>《旧五代史》是宋太祖开宝年中由薛居正监修,历时一年有余而成书的。大体照录了五代的《实录》,是详于史实记载的史书。……《新五代史》由于是作为私人撰述的自由写作,所以是一部能够巧妙地将《史记》文章与《春秋》笔法相结合,使用古文写成的著作。……《新五代史》仿效《春秋》,字里行间皆有寓意。例如,关于战争分别使用了“攻”、“伐”、“讨”、“征”等字眼,认为“攻”为双方相互攻击;“伐”为以大加害于小;“讨”为惩罚罪恶;“征”为天子亲往。这种写作风格不见于《史记》,乃《春秋》笔法。……《新五代史》的分量不及《旧五代史》的一半,记载极为简明。……如此笔法都反映了欧阳公的用意。<sup>⑧</sup></p>
<p>《新五代史》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sup>⑤</sup></p>	<p>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其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其他书法亦各有用意之处。……此可见欧史本纪书法,一字不苟也。……于此可见欧史之斟酌至当矣。<sup>⑥</sup></p>

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sup>⑤</sup>《周书》之所以成为优秀史书,就在于同时满足了上述两大条件。

对两“唐书”作比较分析是认识修史组织形式变迁的重要路径。赵翼称,《旧唐书》“一经修史诸人之手辄芜杂不伦”,堪称“一家著述”的《新唐书》则“力矫其弊……一经对勘,优劣自见”<sup>⑥</sup>。即使共修一部史书,纂修水平上也有优劣。他评论道:

《五代史》系欧公私自撰述,从容订正,故无遗议。《新唐书》则二百八十余年事迹,头绪繁多,不暇检校入细。试平心论之,宋景文于列传之功,实费数十年心力,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sup>⑦</sup>

《新五代史》及《新唐书》本纪部分同为欧阳修所撰,一“从容”,一“不暇”,优劣乃见;同一部史书的不同分纂者,一“费数十年心力”,一“草率从事”,高下立判。宋祁为修《新唐书》呕心沥血,“十余年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sup>⑧</sup>,纂修水平在欧阳修之上乃情理之中。

内藤明确提及对该问题的论述援据了赵翼见解,称:汉唐之间修史皆有一己之见,遵循各自的修史主张,《史记》、《汉书》还以自叙的方式阐明了修史旨趣,因而此期史书多成一家之言;这种修史方法在唐初修《晋书》时全面瓦解,此时虽然制订了修史义例并要求修史成员务必遵守,但是各成员对历史的感受不一,无法发挥自身潜能,众人分纂而成的史书失去了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沦为机械编纂物<sup>⑨</sup>。他还据赵翼见解总结了“一贯精神”何以成就优秀史书:“由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而形成的著作,所以也是出于一贯主张,没有矛盾的成果”;“由于从写作的最初开始就有着既定的主张,所以史家才能够不改变史法。这种在历史著述中坚持一贯精神的做法,是很出色的”。<sup>⑩</sup>

设馆分纂的制度化举措导致“一家著述”终结,即使制订统一义例也无力成一家之言。内藤所论不出赵翼所论范围,思维进路与之相近。不过,内藤在其基础上明白晓畅地道出了史书编纂法变迁的现象及真谛,更具学理性,在继承中有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内藤并未完全依循赵翼的见解和思路。如,赵翼

虽痛感史馆分纂之弊,但对其合理性也多有阐述,批评了“国史听随任修撰”的现象,认为此“究非慎重之道”,主张国史纂修集于史馆<sup>⑪</sup>;内藤则对史馆分纂大张挞伐,认为这意味着史学精神“堕落”、编纂方法“机械”、所修史书“难以称为著述”<sup>⑫</sup>。可知内藤承袭赵翼思想的旨趣在于借助他提供的思想资源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修史组织形式的变迁表现出体制化的特点,一个鲜明标志是天子督办、重臣(通常为宰相)监修成为定则。赵翼认识到,《旧唐书》的实际纂修者以赵莹为核心,张昭远、贾纬、赵熙等各有分工,但进呈时首署刘昫之名,原因在于五代时史馆沿用重臣监修制度,刘昫为宰相。<sup>⑬</sup>与之类似,《旧五代史》首署薛居正之名,也因他以宰相身份监修<sup>⑭</sup>。内藤标举并复述其说,称高官监修国史、史官无法自由褒贬是唐代修史方式发生的最大变化<sup>⑮</sup>。

实录、起居注、时政记纂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修史组织形式体制化的重要表征。在这些问题上,赵翼与内藤做出了十分相似的论述(见表8)。

《实录》起自南朝梁时,虽在唐时因战乱有所毁失,但作为官方史料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唐代兴起的《起居注》、《时政记》可以直接记载天子和朝臣的言行。记注制度经过多次改革而趋于完善,最终三种史学形式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备正史采择的史料体系。宋代史馆制度健全,各朝实录完备,为元人修《宋史》提供了便利<sup>⑯</sup>。这是修史组织形式体制化的结果。

起居注不许天子查阅的惯例直到唐代仍被遵循,入宋以后情况大不相同,起居笔记好后要先由天子查阅再送交史馆。为论证唐代天子不可随意查阅起居注,赵翼叙述了几则唐代起居郎应对天子的史事:太宗要看《起居注》,被朱子奢义正辞严地拒绝。文宗也想看《起居注》,起初郑朗援引褚遂良之例子以回绝,后文宗巧言骗取郑朗后得以查阅;后来,文宗又提出请求,被魏謩坚决驳回;时人称赏魏謩据理力争而贬斥郑朗虚与委蛇<sup>⑰</sup>。到了宋代,实录、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皆由馆臣纂修后进呈天子,衔钦命方可据之修国史<sup>⑱</sup>。内藤几乎完全照搬了这些事例,运用与之相近的论证思路和文字表述,得出了与

《廿二史札记》	《中国史学史》
<p>唐之实录、国史本极详备，然中叶遭安禄山之乱，未造又遭黄巢、李茂贞、王行瑜、朱温等之乱，乃尽行散失。<sup>④</sup></p> <p>左、右史起居注……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宪宗尝问李吉甫：“《时政记》记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馆之实录也。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历朝仍皆有《时政记》，未尝废也。其后又稍变其例。……不必每月送史馆，至岁终始送矣。……自后宰臣奏事及临时处分，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每季送馆。则又不必宰相自撰……于纪录政事，致其详慎，可为后世法也。<sup>⑤</sup></p>	<p>唐的《实录》又由于当时战乱频仍而多有缺佚。……在唐代是由起居郎、起居舍人负责书写《起居注》的。有可能起居郎是负责记录行动，起居舍人是记录言论的。由于二者都是微官，当然天子与宰相在朝堂对话时，是不能在近旁记录的，他们只在紫宸殿阶下记录一切。总之，殿上之事姑且可以不记录，但朝政结束、百官退朝后，对于天子与宰相之间的特别对话，根据何种方法记录则是有所规定的。……后来，又出现了《时政记》，这主要是由起居郎、起居舍人在退殿之后记录的。这两种体例的史料虽然都延续到了宋代，但是后来则仅仅流行《时政记》体了，而且随着天子本人可以亲览《起居注》情况的出现，这一体例似乎也不太实行了。<sup>⑥</sup></p>

之一致的结论，并凸显出唐宋之间“在可信史料之形成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唐时尚能延续“自由记事风气”，而宋时须唯天子马首是瞻<sup>⑦</sup>。这些史实散落于两“唐书”各处，赵翼在考论史事中将之归纳起来展开再叙述。这一过程必然渗透进其主体意识。内藤纵使能从原著中获取这些信息，也难以做出如此相似的再叙述。内藤极有可能根本未读两“唐书”，而是直接照搬赵翼的叙述。换言之，其论断未必建立在研读一手材料之上。这种情况在内藤著作中是较为普遍的。

#### 四、结语

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不是史籍中现成提供的，而是在考论历代史籍中抽绎出来的，是创造性诠释的成果。他深通“会通”“明变”之旨，善于抓住转折期的关键问题，进而烛照中国史学变迁之大势，故此，其考论成果多收发人深省之效。

研读赵翼著作是内藤及其弟子乃至整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看家宝之一”<sup>⑧</sup>。“内藤史学”在意涵和形式上深受“赵翼史学”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内藤的“唐宋史学变革”说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资源是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其《中国史学史》明确提及对赵翼见解进行评述、引证或批驳之处就达二十余处。该书系内藤口授，时隔多年后才根据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据他的学生神田喜一郎

回忆：

内藤湖南先生授课或讲演是决不带讲稿的，偶尔带上一张备忘似的小便条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了。总之，讲稿都装在先生的脑袋里了。不过，先生总是用包袱带来一大包参考书，多是些大小厚薄的各种汉籍书，而且数量很多，一次就带来数十册书亦非罕见。然后先生总是一本一本、这里那里地一边翻阅一边绵延不断、一丝不苟地进行讲述。<sup>⑨</sup>

由内藤对赵翼的钦仰之情可以推想，他在授课时必定对赵翼著作多有引述甚至照读，从该书在基本论点、思维进路和文字表述上都与赵翼著作保持惊人的一致上，便可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倘若该书系内藤亲自执笔而成，承袭痕迹将更为显著。

内藤何以如此推重赵翼并承袭其思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往往具有同一性，“赵翼史学”散发的魅力影响到“内藤史学”的品味。“高明”有余而“沉潜”不足的内藤对赵翼史学思想的钦慕和认同很大程度上缘于二人在治史理念、史学风格、学术见解和性格特质上的深度契合。他在《中国史学史》中总结了赵翼其人其学的特点：感性胜于理性，学究气较淡；诗文造诣深厚而经学素养不足，故而由文入史而非由经入史；治史多采“无须博览多识之精明的方法”，学力虽不及钱大昕、王鸣盛，但“笔触机敏，读起来很耐人寻味”；“由于他通达世故所以有着相当敏锐的议

论”，尤其擅长“对历史大势的通论”；“通论中蕴含着一种创新的见识”，“不蹈袭前人”，“有立异之心”<sup>⑥</sup>。“精明”、“机敏”、“通达”、“大势”、“创新”、“立异”等等是赵翼为人治学的鲜明特点，倘移之于内藤，亦恰如其分。

内藤对赵翼思想既有承袭，又有发展，统归起来，大略有如下诸端：

第一，扩大了视野。时间视野上，赵翼考论时域大约自西汉至清初，内藤扩大为上古至20世纪初。空间视野上，赵翼考论范围局限于中国，内藤论及日本和西方。文献视野上，赵翼主要运用“二十四史”，对《史通》、《通典》、《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广记》、《通志》、《玉海》、《文献通考》等史籍虽有援据，但着墨较淡，而内藤较多地引述了上述史籍，对清中叶和近代文献也有征引。

第二，深化了认识。如，赵翼认识到汉唐之间史注崇尚“博”和“忠”的特点：经注“援引该博”的风尚影响到史注，裴松之《三国志》注“大旨在于搜辑之博，以补寿之阙”<sup>⑦</sup>；唐初《汉书》注家虽众，却“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颜师古《汉书》注以班固的“忠臣”而被后世奉为“准的”<sup>⑧</sup>。内藤捕捉到这些信息，并循此思路论述史注的发展状况，明确揭示出唐宋之间史注发生了由忠实原著到己意解史的变迁<sup>⑨</sup>。再如，赵翼虽提及《史通》、《新唐书纠谬》等史评类著作，但多引据以考论正史，极少直接论述，对宋之后史评家几乎未有提及，而内藤在史评变迁问题上着墨甚浓，专辟“史评的发达”一节评述了汉至唐史评类著作，认为史评发展到唐代“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门专业”<sup>⑩</sup>。

第三，完善了思维进路。如，赵翼通过比较两“唐书”、两“五代史”的不同来探讨史书编纂法的变迁，内藤除承袭这一思路外，还通过比较同在宋代编纂的《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的不同来揭明主旨：二书虽皆是应帝王资鉴之运而出现的史籍，但编纂风格、方法截然不同，崇尚赅博的《册府元龟》沿用汉以来流行的类聚法，而由博返约的《资治通鉴》顺应学术新风而“逆反于前代学问那种注重多闻多识的学风”，二书可视为“对前后时代进行划分的代表作”<sup>⑪</sup>。此外，内藤还通过《史通》与《通志》之间史评

的变迁，《隋书·经籍志》与《史通》之间典籍分类法的变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收典籍目录的变迁，汉至宋金石学的发展等思维进路揭明主旨。

第四，强化了理论自觉。赵翼史识卓著，见解独到而深刻，考证有力，对史学现象的叙述较多，但精神自觉较弱，思想丰富而理论匮乏，许多认识多停留在考实性层面。内藤的学说虽有学理性不足的缺陷，但精神自觉较强，不见功力却甚具识见，敢于和善于进行理论探讨，在抽象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上优于赵翼。如，赵翼归纳出修史组织形式及观念变迁的种种现象，却未能作出断语，而注重演绎的内藤将之与由贵族政治到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变迁联系起来考察。“唐宋史学变革”说正是内藤借鉴赵翼的史学成果运用现代概念工具建构出来的。

#### 注释：

①单磊：《内藤湖南“唐宋史学变革”说阐微》，《史学月刊》2015年第3期。

②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0，《唐古文不始于韩柳》，中华书局2013年版。

③[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138页。

④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

⑤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7，《梁陈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⑥[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37-138页。

⑦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5，《后周诏诰用尚书体》。

⑧[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41页。

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3，《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记载》。

⑩[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41页。

⑪[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39页。

⑫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8，《新书好用韩柳文》。

⑬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11，《新唐书文笔》。

- ⑭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8,《新书尽删骈体旧文》。
- ⑮[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39页。
- ⑯[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51-153页。
- ⑰[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39页。
- ⑱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8,《新书详载章疏》。
- ⑲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9,《宋书多徐爱旧本》。
- ⑳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9,《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 ㉑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 ㉒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10,《旧唐书多国史原文》。
- ㉓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过秦论三处引用》。
- ㉔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 ㉕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0,《南史删宋书最多》。
- ㉖[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13-114页。
- ㉗[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15页。
- ㉘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7,《梁陈二书》。
- ㉙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9,《梁书多载饰终之诏》。
- ㉚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7,《梁书多载芜词》。
- ㉛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0,《南史增删梁书处》。
- ㉜[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15页。
- ㉝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11,《新唐书文笔》。
- ㉞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6,《新唐书》。
- ㉟[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51-153页。
- ㊱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1,《薛史失检处》。
- ㊲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1,《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 ㊳[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57页,第153页。
- ㊴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 ㊵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1,《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 ㊶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1,《欧史书法谨严》。
- ㊷[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56-157页。
- ㊸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6,《三国志书法》。
- ㊹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5,《汉书》。
- ㊺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3,《北史全用隋书》。
- ㊻[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15页。
- ㊼[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382页。
- ㊽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7,《一人二史各传》。
- ㊾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3,《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
- ㊿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7,《隋书》。
- ①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5,《隋书志》。
- ②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6,《梁陈周齐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 ③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7,《周书》。
- ④赵翼著,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11,《新唐书文笔》。
- ⑤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6,《新唐书本纪书法》。
- ⑥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6,《新唐书》。
- ⑦[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382-383页。
- ⑧[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16页。
- ⑨赵翼著,马彪译:《陔余丛考》卷17,《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
- ⑩[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16-117页。
- ⑪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源委》。

⑫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1,《薛居正五代史》。

⑬[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383页。

⑭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6,《唐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

⑮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9,《时政记》。

⑯[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94-195页。

⑰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3,《宋史多国史原本》。

⑱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19,《天子不观起居注》。

⑲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3,《宋史事最详》。

⑳[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48页。

㉑刘正:《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㉒[日]神田喜一郎:《跋》,[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396页。

㉓[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264-265页。

㉔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6,《裴松之三国志注》。

㉕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0,《唐初三礼汉文书文选之学》。

㉖[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45-146页。

㉗[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27页。

㉘[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第158-159页。

## Zhao Yi's Thought of "Tang-Song Historiography Transi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Naito Konan

Shan Lei

**Abstract:** Zhao Yi had an insight into the trend of Chinese history when he was doing research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explicated his thought of "Tang-Song Historiography Transition", that i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the typ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changed from rhythmical prose characterized by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to ancient prose, and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 changed from copying raw materials to innovational compilation, and the authors of historical books changed from single author to official historians who compiled historical records separately. Influenced by Zhao Yi's thought, Naito Konan advanced his own theory of "Tang-Song Historiography Transition". Through a study of his views, evidences, logic, train of thought and its formulation, we can learn that he carried on and developed Zhao Yi's thoughts and took the point further. Its reason is that Naito Konan's idea, style of research and his academic view and nature agreed with those of Zhao Yi's.

**Key words:** Zhao Yi; Naito Konan;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ong Dynasty; historiography; influence